



人与兽

洛拉西莫夫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人与兽

格拉西莫夫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1 北京

责任编辑：高 川

封面设计：乃 董

人与兽——格拉西莫夫电影剧本选集

中国 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北京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 × 1168毫米1/32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00,000 印数：2,000册

1991年6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474-X / I·0047 定价：7.20元

序

著名苏联电影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1906~1985)是一个与苏联电影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人物,他的活动领域包括导演艺术、表演艺术、电影剧作、教育、社会活动这样广阔的范围。格拉西莫夫的艺术创作始终体现对时代重大问题的关注,表现了对种种社会现象的鲜明观点。作为艺术家,格拉西莫夫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导演和剧作两个方面。

导演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创作道路是一个确切地感受时代的过程。

七十年代初,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在接受一次记者采访时曾说:很难设想,如果我不从事电影工作,我的生活将会怎样?他说,革命的电影造就了他和他的同龄人,即二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工作者们。在那个时代的集体创作中,他们享受到劳动的欢乐。格拉西莫夫认为,从事电影创作使他得以介入生活,在银幕上表现历史的进程。

在电影这项不断发展、永不停顿的事业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格拉西莫夫始终思考着周围发生的事情,分析自己的成功与失误,力求确切地了解人们期待于电影艺术的是什么。

“奇异演员养成所”是格拉西莫夫艺术道路的起步之地。二十年代俄罗斯文艺界出现过不少艺术类的学校、研究所、“养成所”,它们的道路,正如“奇异演员养成所”一样,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奇异演员养成所”起先热衷于戏剧活动,后来把兴趣转向了

电影艺术。192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格拉西莫夫从B. H. 弗谢沃洛茨基—盖思格罗斯的实验剧院进入了“奇异演员养成所”。在当时还很年轻的教师Г. 柯静采夫和Я. 塔拉乌别尔格领导的这个创作集体中，一群才华横溢、渴求探求的青年人一起实验，拍摄了许多作品。格拉西莫夫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反面人物。在那个革命风暴席卷世界的年代里，格拉西莫夫的艺术道路与时代的洪流紧紧相连。为了拍摄《新巴比伦》，格拉西莫夫认真学习了巴黎公社史，在影片中扮演了记者鲁特罗。格拉西莫夫认为，拍摄这部影片使“奇异演员养成所”的艺术探索从注重形式转向注重作品内容，开始创造现实主义的人物形象。在“奇异演员养成所”里，格拉西莫夫主要担任演员；至于导演工作，他只在影片《一个女性》中作为副导演进行过一次尝试。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真正导演艺术诞生是在三十年代。当时，电影蒙太奇手段正处于兴起时期，格拉西莫夫爱上了导演艺术，意识到电影导演是发挥他的创作才能的适宜工作。散文式的电影叙事方法、对角色的心理刻画、言语、演员表演这些在当时的有声电影里占统治地位的电影元素，对格拉西莫夫独特的导演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柯静采夫和塔拉乌别尔格的帮助下，格拉西莫夫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开始了新的创作活动，执导了《二十二个不幸》、《森林》、《所罗门的心》、《我不爱你?》等四部影片。在这些涉及时代迫切问题的影片里，他努力探索自己的创作主题和电影叙事方法。

苏维埃新人和劳动者的主题是格拉西莫夫努力探索的创作课题。在他1936年执导的《七勇士》中，这个主题有了明显的开拓。影评界认为，《七勇士》显示了格拉西莫夫的导演才华，是“第一部格拉西莫夫式”的影片。在这部影片里，导演处理生活素材的独到手段，表达时代精神的激情引起了观众的振奋和艺术界的关注。

《七勇士》的素材取自1932年《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倡议组织青年进行极地越冬考察的号召书。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和作家尤里·格尔曼合作，利用一些极地考察站的材料，写成了电影剧本。拍摄组直接在北极地区进行工作，因此，这种几乎是纪实性的背景使影片具有真实可信的感人力量。影片描写了极地考察站的青年人在平凡的事业中建立的功勋。艺术家把一群青年人塑造得平凡又不平凡：他们创造着英雄的业绩，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功绩。主人公们认为，为祖国建立功勋是他们的天职，英雄主义是他们固有特征。

1938年，格拉西莫夫完成了歌颂阿穆尔河上的青年开拓者的影片《共青城》。在这部影片里，苏维埃新人的主题、劳动者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影片描写青年人在荒无人迹的原始森林里经受严峻的考验，建设共青城的故事。与《七勇士》相比，格拉西莫夫把人物的性格表现得更为复杂，从更多的侧面展示了人物的相互关系。在规模更为广阔的事件描绘中，导演塑造了一组阿穆尔河上青年城市建设者的群像，并赋予每个主人公以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命运。影片成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独特气息，记录了三十年代苏联青年的美好形象。

在拍摄《共青城》的过程中，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完成了影片《教师》的构思。《共青城》的拍摄工作完成后，格拉西莫夫回到列宁格勒，写好了《教师》的剧本。在《教师》里，导演用亲切的笔触，抒情地描绘了他童年熟悉的乌拉尔地区的人和事。《教师》记述了主人公斯捷潘·拉乌金到一个村庄任教的故事。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日新月异的生活在他面前展示的一切新的、陌生的东西。斯捷潘既教人们，又向人们学习，“需要掌握知识，并且传授给人们”，这是艺术家着力表现的主人公生活的最高任务。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艺术家提出了人的天职及其在社会中应占的位置这一主题。影评认为，在格拉西莫夫的早期作品中，这部影

片最富于他的个人色彩。格拉西莫夫后来回忆说，这部影片的主人公们都是他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影片是用乌拉尔地区格拉西莫夫的家乡话进行对白的，这就使它更富有生活气息。格拉西莫夫对这部影片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在《岁月与我》一书中回忆：“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因为他勾起我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和青年时代对未来的憧憬。影片主人公经过痛苦的探索，最终从迷误走向成熟。”

柯静采夫对《教师》相当赞赏。在《岁月与我》中，格拉西莫夫记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放完《教师》的样片后，“我和柯静采夫一起来到走廊，他带着神秘沉思的神情对我说：‘谢廖日卡，多么好的一部影片！’从此我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导演、老师和朋友。”

1941年，为纪念莱蒙托夫逝世一百周年，格拉西莫夫在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着手把这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假面舞会》搬上银幕。《假面舞会》描写了一个反抗上流社会的人物的悲剧命运。1941年6月22日，这部影片拍摄完成，进入审片阶段，然而，战争爆发了。

8月31日，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加入了苏联共产党，在方面军政治部工作。按照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日丹诺夫的提议，格拉西莫夫等列宁格勒的电影工作者们拍摄了《夏伯阳和我们一起》、《同马克西姆的会见》、《胜利属于我们》、《老近卫军》等有关战争中的列宁格勒的短片。这些影片反映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人保卫城市的顽强精神，其中不少镜头是实地拍摄的，有的是在敌人的炮火和轰炸下抢拍的。列宁格勒人民与严寒、饥饿作斗争的顽强不屈的精神激励了格拉西莫夫的创作热情，在被围困的日子里，他拍摄的《列宁格勒的居民们》（又名《不可战胜的人们》）、《土地》，歌颂了列宁格勒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整个战争时期，格拉西莫夫从未停止过创作。他曾随同新闻

摄影记者到过解放不久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也曾率领摄制组采访过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1944年格拉西莫夫被派往莫斯科中央电影制片厂任厂长。1945年，他被任命为战时新闻电影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录电影制片厂厂长，并在全苏国立电影学院担任导演和表演系的教学工作。

战后，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把教学工作和拍片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拍摄了在苏联电影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影片《青年近卫军》（1948）。影片《青年近卫军》是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小说《青年近卫军》的发表是战后初期苏联文化生活的重大事件之一。这部小说尚未全部完成时，小说的作者法捷耶夫就把手稿给了格拉西莫夫。导演被小说主人公的英雄行为深深感动，便让学生们在舞台上演出小说的片断，后来改编成影片搬上银幕。《青年近卫军》描写了1943年2月苏军解放克拉斯诺顿市前夕，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壮烈牺牲的事迹。五十六名近卫军队员遭到了法西斯凶残杀害。这部影片在对素材作宏伟史诗式处理的基础上，对英雄主义主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刻的分析和思考。《青年近卫军》充分表现了格拉西莫夫在战前的几部影片中所致力探索的创作主题——表现苏维埃人，同时又显示了这位艺术家创作中的新特点——对时代与人的思考。格拉西莫夫曾说，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中使他最为激动的是关于人应该对社会、对人民担负责任的思想。因此，在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的过程中，格拉西莫夫坚持了三十年代和战争期间苏联电影艺术的优良传统，把深入人的性格放在创作的首位。导演令人信服地表明，同法西斯的殊死斗争是青年近卫军战士的世界观、人生观的自然表明，是苏联人民的天性使然。一个个年轻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投入了这场捍卫祖国的斗争，在青年近卫军这个统一的组织里，他们的爱国主义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格拉西莫夫通过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兼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处理方法，揭示了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导演在对日常生活进行有血有肉的描写基础上，对战争现实进行了哲理性思考，使英雄主义、抒情色彩、乐观主义和悲剧成分溶汇成一股强烈、深沉、真挚的叙事语调，使影片的抒情叙述和对人物的刻画都达到了深刻的心理描写效果。战后的最初几年，苏联电影中主人公形象或者毫无生气，或者被故意拔高，千人一面，失去个性，因此，《青年近卫军》对英雄人物充满人性、富于人情的心理刻画和性格描绘，就尤其值得注意。《青年近卫军》问世时，B. 普多夫金为之深受感动，指出影片在导演叙事和剧作结构上的创新，认为影片的表演处理是高尚的、克制的富于激情和感染力的。同时，还应该强调指出，《青年近卫军》的改编成功再一次肯定了格拉西莫夫学派恪守的基本原则：把心理描写、问题性、文学性、特殊的表演中心论、激情与理性和谐地统一起来，把密切注视人的精神世界放在首位，使形象的实质达到可信的有机的体现。格拉西莫夫的《青年近卫军》创作集体，为苏联电影造就了一个出色的演员阵容，并以《青年近卫军》工作室的名义载入了苏联电影史册。在该片中担任角色的演员都是法捷耶夫和格拉西莫夫一起挑选的，这些电影学院格拉西莫夫工作室的学生中，有许多人经历了战争的考验。格拉西莫夫对于时代与人民的长期思考，通过这些过去的战士和游击队员们所创造的鲜明生动的个性，对刚刚成为历史的这场战争，作了精神上、情绪上的总结。

十年之后，格拉西莫夫把在苏联二三十年代的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肖洛霍夫的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搬上银幕，拍摄成电影史诗《静静的顿河》(1957—1958)，并获得第一届全苏电影节一等奖。苏联评论认为，这部大型电影史诗，确实是一部“活现了的”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直书生活的全部真实，作者以现实主义作家的非凡胆识，客观地、真实地描述生活，

使主人公在他的笔下自然而然地存在。小说《静静的顿河》，无论就其反映现实的角度，还是就其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乃至语言风格，都具有独特的面貌。然而，这部作品的倾向性比较隐晦，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格拉西莫夫的电影史诗不是小说的翻版。在这部银幕作品中，艺术家注入了他个人的情趣和渴求，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传达了他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以及他在时代的转折阶段关于革命和战争中种种社会现象的思考。多年来，这部电影史诗在世界银幕和电视屏幕上经久不衰的放映事实表明，这部影片是一部独立的、根据文学作品创作的、又与文学原作并存的、重要的、有份量的艺术作品，是苏联电影为之骄傲的。

六七十年代以来，格拉西莫夫的创作更是硕果累累。他的创作题材越来越广泛，涉及到不同命运的人们。格拉西莫夫自己说，这一时期他的电影作品很大程度上是献给年青一代的。在这期间，他用十年时间自编自导了“六十年代人”四部曲：《人与兽》(1962)、《记者》(1967)、《湖畔》(1970)、《要热爱人》(1972)。“六十年代人”四部曲以其对苏联当代社会所作的严肃的、富于哲理性的分析，引起了苏联国内外的广泛兴趣和注意。在阐述影片的创作目的时，格拉西莫夫曾说，他拍摄“六十年代人”四部曲是为了同观众共同讨论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青年一代的使命以及他们的幸福观、爱情观……。1975年，格拉西莫夫把著名剧作家A. 沃洛金的优秀剧本《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搬上银幕，并被苏联《银幕》杂志评为1976年优秀影片。这部以家庭和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影片，通过一个被父母遗弃了的女青年的生活片断，反映了苏联社会在伦理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

早在拍摄《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之前，格拉西莫夫就已着手改编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1984年4月，格拉西莫夫由于创作了反映彼得大帝业绩的历史故事片《彼得的青年时代》和《光荣事业的开端》而荣获列宁文艺奖金。

八十年代的今天，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创作活动仍然非常活跃。格拉西莫夫的案头经常放着世界各国文学大师们的作品。他认为，这些作品帮助他去更深地挖掘生活，洞察世界。战前他就构想拍摄一部关于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影片。1984年，他自编、自导、自演了《托尔斯泰》，并获第十八届全苏电影节特别奖。

格拉西莫夫认为，托尔斯泰是一位卓越的、擅长现实主义心理描写并具有精湛的写作技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引导人们去思考人类的道德准则。托尔斯泰以细腻、抒情的笔触描绘了人的心灵这个隐秘深奥、无比开阔的世界。影片《托尔斯泰》取材于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和日记，分上集《失眠》和下集《出走》，介绍了作家晚年的一个生活片断：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他所从属的那个阶级的道德观之间的不一致性，为摆脱贵族生活终于离家出走。列夫·托尔斯泰的哲学观和他的道德探索是这部影片的主题。导演在这部作品里反映了这位伟大作家充满矛盾的一生，以及他对人生的痛苦的探索过程，表现了他关于俄罗斯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贵族和劳动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等重重疑虑，以及他对生活的意义、人的使命、人对社会及人民的责任的思考。

导演艺术大师谢尔盖·格拉西莫夫能够准确敏锐地感受时代的特点，善于准确地再现环境气氛，因此，他影片的主人公们都是历史具体的、历史可信的时代形象。这些银幕人物的外貌与他们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都是和谐统一的。格拉西莫夫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据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创作的影片，可以研究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今天的苏联人的生活：《共青团城》和《七勇士》已经成了三十年代的时代风貌的文献资料；四十年代的《青年近卫军》展示了两个世界的截然对立——以苏联人民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的、进步的世界与希特勒法西斯

斯为代表的灭绝人性的、残酷的、黑暗的世界的对立；六七十年代格拉西莫夫创作的影片则揭示出一个个新的题材和新的主人公。无论是为保卫贝加尔湖的自然生态平衡而仗义执言的《湖畔》，还是满怀激情地宣传新城市的建设，并正确处理道德问题的《要热爱人》，以及与小市民和市侩习气作斗争的《记者》，还有涉及两代人的交替和道德感情的培养问题的《做女儿的和做母亲的》，均以各自具有的认识上的、心理上的、哲理上的、思想意识上的种种特点，织成了生动的、多姿多彩的电影叙事图画，塑造了每个时代的独特形象，丰富了苏联电影艺术肖像画廊。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不仅是导演艺术大师，而且还是剧作家。他导演的影片，绝大部分是他自己创作的：《森林》(1931)、《我不爱你？》(1934)、《教师》(1939)、《假面舞会》(1941)、《不可战胜的人们》(1942)、《大地》(1944)、《青年近卫军》(1948)、《解放了的中国》(1950)、《希望》(1954)、《静静的顿河》(1957—1958)、《六十年代人》四部曲(1962—1972)、《托尔斯泰》(1984)。

格拉西莫夫的文学修养在于敏于感受并善用技巧。在电影剧本里，他设计了许多形象，在导演实践中，他从那些跃然纸上的形象里培植出生动的个性，使他们活跃在银幕上。

格拉西莫夫在理论上曾多次指出电影艺术与文学的亲缘关系。他认为，文学是电影创作的思想源泉。在《电影导演的培养》一书中，他指出：“文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对于电影艺术的形成有着头等重要的影响，对它的形态特征、美学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语言的形成，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离开文学，要充分理解电影是不可能的。”格拉西莫夫是“文学电影”这一样式的推崇者。他曾说，“当有人赞叹说：‘我看了一部影片，就像读了一本好书！’我就把这样的反映视为对电影艺术工作者的最高评价。”在艺术实践中，格拉西莫夫偏爱那种对人物性格和环境背景作详尽刻画的

文学叙事风格。在他的优秀影片里，戏剧性成分始终与规模恢宏的叙事及深刻的心理分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艺术原则也是他创作电影剧本的依据。格拉西莫夫把文学形象视为电影剧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电影剧本，相对地说，可以作为独立的文学创作。法捷耶夫本人在读了格拉西莫夫编写的《青年近卫军》电影剧本后说，他仿佛读了一部全新的作品。

格拉西莫夫的电影剧本具有相当程度的可读性，可以在不考虑银幕，不考虑视觉艺术特点的情况下进行阅读。而且，因为电影大多是描绘情景并且讲述故事的，因此，作为电影剧作家的格拉西莫夫，同样要应付散文作家面临的创作问题，而且，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往往与他的文学同道们相类似。然而，对于格拉西莫夫来说，编写电影剧本又是电影创作工作的一部分。因为，他是在编写未来的影片，在组织它的结构，在思考将要表现在银幕上的主题，因此，从他的电影剧本中可以感觉到艺术家的笔同时针对着读者和观众。阅读格拉西莫夫的电影剧本，有助于读者对他终生所从事的导演工作的了解。

收入本集的“六十年代人”四部曲，是格拉西莫夫以电影长篇小说的形式创作的。在这部作品里，剧作家格拉西莫夫所特有的深刻的心理分析、详尽的背景描绘等文学叙事风格，表现得相当明显。

四部曲的第一部《人与兽》于1962年拍摄完成。影片的主人公巴甫洛夫曾在战争中被俘。离开集中营后，巴甫洛夫在西方国家颠沛流离了十多年才回到祖国。在苏联，巴甫洛夫与一位在列宁格勒围困时期受过他搭救的妇女安娜·安德列耶甫娜不期而遇。于是，他与安娜及她的女儿塔尼亚结伴从莫斯科出发，开始了横越苏联国土的旅行。旅途中，巴甫洛夫把自己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遭遇讲述给安娜母女俩听，他自己也在旅途中了解了苏联人多姿多彩而又充满矛盾的现实生活。

四部曲的第二部《记者》完成于1967年。影片叙述了青年记者阿利亚比耶夫在苏联国内及国际舞台上的采访活动，描写了他个人生活中的种种遭遇。该片获第五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

第三部《湖畔》于1970年拍摄完成。影片的故事围绕着在贝加尔湖畔建设大型工矿企业过程中的思想斗争展开。一部分人坚持要保护自然，另一部分人则要开发自然。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切尔内赫和列娜在争论过程中相互看到了对方的长处，并产生了爱情。《湖畔》曾获1971年度苏联国家文艺奖金。

《要热爱人》(1972)是“六十年代人”四部曲的第四部，获第六届全苏电影节一等奖。影片描写青年建筑师德米特里·卡尔梅柯夫在北极城的劳动和生活。这个性格独特、富于激情的年青人在城市建设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他和玛丽亚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上的波折，构成了影片的全部内容。

从剧本的题材和所叙述的内容看，这四部影片并没有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把它们松散地联在一起的是情节展开的时间和剧作者多方面、多层次地观察当代苏联人生活的愿望。格拉西莫夫在四部曲里再现了普通苏联人的生活，包括他们的欢乐与忧虑、幸福与痛苦。在这组剧本里，剧作家仿佛在和读者一起讨论苏联的社会风貌，研究普通苏联人的道德规范，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从剧本中已经可以看出，展现多层次的社会现状，在时代交替的关键时刻剖析一代人的社会意识，对一些重大而紧迫的社会问题作出全面分析，还有众多的人物形象、令人难忘的主人公命运的变化过程——这种反映生活的手段是“六十年代人”四部曲的共同点，它明显地带有作者的个人色彩。

格拉西莫夫在这组剧作中充分运用文学散文的叙事手段来描绘未来影片的主人公们，并以这些银幕形象来体现艺术家本人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他对生活的理解。

格拉西莫夫的剧作具有生动的形象性。在这组四部曲中，年

轻主人公们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命运。《人与兽》中的塔尼亚过于自信；《记者》中一帆风顺的阿利亚比耶夫突然几濒绝境；《湖畔》里性格倔强的列娜为了灼烤着全身心的激情决心改变自己，改变世界上的一切，然而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贝加尔湖，为的是逃避她的初恋，也可能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要热爱人》里的卡尔梅柯夫性格刚强，近乎怪癖，但富于激情。剧作家格拉西莫夫没有简单地表现生活，而是通过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以抒情散文的细腻笔触，娓娓道出了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道出了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隐秘、震颤和波澜，并揭示了他们认识世界的渴望及他们对理想的追求。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复杂的个性，是一系列活生生的形象。

格拉西莫夫认为，电影艺术是“活现了的文学”。电影作品的特点不仅取决于电影剧本的形象性，而且取决于艺术语言的力量；而这种艺术语言，实质上最初是在电影导演的笔下产生的。在导演记录未来影片的意蕴和情调的过程中，他的构思逐渐成熟，复活，再现。这种构思，在读者看来是文学，而在格拉西莫夫的设想中已经是电影了。从“六十年代人”四部曲的剧本中，读者也可以感觉到影片与剧作的这种自然的、有机的联系。因此，可以说，“六十年代人”四部曲是格拉西莫夫所致力“文学电影”的一次成功实践。

作为电影导演和剧作家，谢尔盖·格拉西莫夫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既擅于深刻的心理刻画，又长于细腻的抒情描绘；既能表达鲜明的激情，又能创造强烈的悲剧性。格拉西莫夫在艺术上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他的作品主要涉及当代题材。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面临每个时代的紧迫问题，艺术家始终在进行着不倦的探索，苦苦的思考，不懈的劳动。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曾说，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当他感到自己还能有益于社会时，不会产生那种已经走到人生尽头的感觉。他在年事已高时，仍然锐气不减当年地在电影艺术中寻求新的道路，探索新的可能性，力求把他的同时代人的事业、思想、感情和追求更深刻、更全面地反映在苏联银幕上。

谢尔盖·格拉西莫夫坚持把他的每一个构想，亦即脑海中的每一个镜头，都用观众或读者的所感所受来检验。因此，一代代观众和读者不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美感享受，而且可以找到生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答案。

胡 榕

1985年5月

目 录

人与兽..... (1)

记 者..... (119)

湖 畔..... (255)

要热爱人..... (325)
